

印度核试验动机探析^{*}

谢 超◎

【内容提要】 通过对 1974 年和 1998 年印度核试验进行对比分析和论证，本文认为印度对自身实力的判断与外部对其实力的判断之间存在差距，这使得其实际国际地位与自身期望存在落差，印度对自身实力的高自信和不稳定国家自尊易引发攻击行为。印度通过核试验这种攻击行为向外界宣示实力，其目的在于获得国际认可和提高自身国际地位。在信号传递效果方面，核试验的技术水平和成本影响信号传递效果，技术水平体现国家实力，成本反映决心。印度在 1998 年核试验中的技术水平和对机会成本的承受能力反映出印度争做世界大国的决心和潜力，获得了国际体系主导国美国的认可。

【关键词】 核试验 国家自尊 大国地位 印美核合作

【作者简介】 谢 超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电子信箱：
xiechaocn@gmail.com。

本文主要关注印度核战略及实践在印度获取大国地位外交方略中的作用，特别是印度在 1998 年核试验之后，从之前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经济和军事制裁，到随后印美核合作的不断发展，印度在核领域的长袖善舞让世人惊讶。本文力图探析印度进行核试验和追求

* 感谢清华大学发展中国家博士项目组织的工作坊讨论，感谢庞珣老师在讨论中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文中存在的错误和疏漏由笔者负责。

《国际政治科学》2014 年第 2 期（总第 38 期），第 1—30 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核国家地位的动因，对该问题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印度进行核试验和发展核实力的策略能得到既有国际体系，特别是体系内主导大国美国的认可和支持的原因。因此，在梳理和批判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核试验在传递印度国家实力信息方面的作用机制，探寻印度是如何通过核试验释放信号并获得美国对其国家实力的认可，从而提升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借此分析和总结印度核崛起和大国外交策略，思考中印外交的走向。

一 既有研究成果回顾

对于印度多次进行核试验和追求核国家地位尤其是在 1998 年进行系列核试验的原因，学界有很多解释。一些学者强调印度国内的政治变化导致了印度核政策的变革，特别是在核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印度人民党取代长期占据印度政治主导地位的国大党上台执政后，印度核政策很快就发生了变革。因为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印度人民党在 1998 年 3 月执政后，5 月 11 日和 13 日印度就进行了 5 次核试爆，使得第一个提出禁止核试验国际条约倡议的国家成为第一个废弃这个宗旨的国家，因此瓦杰帕伊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是导致印度核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① 该观点对于国内政治层次的分析十分重要，但是需要注意到的经验事实是在此之前，印度国大党一直是印度追求核国家地位的主要推动者，没有自 1974 年印度第一次核试验以来的经验和技術积累，人民党政府很难在短时间内具备核试验的能力。^② 另有报道显示印度进行核试验的打算由来已久，早在 1995 年

^① Sumit Sarkar, "The BJP Bomb and Aspects of Nationalism,"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33, No. 27, 1998, pp. 1725 - 1730; Gaurav Kampani, "From Existential to Minimum Deterrence: Explaining India's Decision to Test,"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 6, No. 1, 1998, pp. 12 - 14; 张位均 《印度核试验与南亚安全》，《当代亚太》1998 年第 6 期，第 9 页。

^② 早在 1980 年 3 月回答印度联邦院议员质询时，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就宣称如果国家利益需要，印度将毫不犹豫再进行一次核爆炸。参见《印度甘地夫人宣称必要时将再次进行核试验》，法国《世界报》1980 年 3 月 15 日。

就准备进行核试验，但因美国间谍卫星和情报部门发现了有关迹象并公开披露，印度迫于压力而中止。^①可以说印度核试验的雄心在前，人民党执政后只是扣动了印度进行核试验的扳机，从时间顺序上不构成因果关系，因此人民党执政无法全面而充分地解释印度核试验的动因。

另外有一部分学者强调国家间因素，即印度政府一直强调的所谓安全威胁，一是巴基斯坦带来的现实威胁，二是中国带来的潜在威胁，印度进行核试验和成为事实核国家的行为只是为应对来自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威胁。^②也有学者综合以上国内政治因素和外部威胁因素，认为影响印度核试验决策的国内因素是人民党上台执政和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外部因素则是印度面临的来自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威胁，两者相互作用促使核试验决策的出台。^③但上述观点面临的重大挑战在于，对于巴基斯坦的现实威胁一项，印巴两国的冲突史虽然能验证巴基斯坦对于印度的现实威胁，但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在三次印巴战争中印度都占据上风，并且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印度还实现了分解巴基斯坦的目的。长期以来印度对于巴基斯坦的常规军事优势是明显的，印度没有必要冒如此大的风险进行核试验来平衡比自己弱的对手带来的威胁。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巴基斯坦带来的威胁不足以构成印度发展核武器的主要动因，因此单独强调中国对印度构成的“威胁”，即印度追求核国家地位是为了平衡中国核实力的威慑和在未来与中国的竞争中获得核平等地位，因此做出核试验的决策。^④强调中国对印度带来的所谓潜在威胁，这也是印度政府在核试验之初对外解释的主要理由所在，但这一解释面临的挑战在于，虽然印度重视中国强大影响力值得理解，但是在印度对外强调的中印边界问题上，中国是保持现状的国家，反而是印度在不断挑起争议；在印度强调所谓中国

① 王军平、柳缠喜《印度在核试验前的情报封锁》，《现代军事》1999年第2期，第54页。

② Sumit Ganguly, "India's Pathway to Pokhran II: The Prospects and Sources of New Delhi'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 pp. 148 - 177.

③ Samir K. Sen, "He who rides a Tiger: The rationale of India's nuclear tests,"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8, No. 2, 1999, pp. 129 - 136.

④ Andrew B. Kennedy, "India's Nuclear Odyssey: Implicit Umbrellas, Diplomatic Disappointments, and the Bomb,"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2, 2011, pp. 120 - 153.

援助巴基斯坦威胁到印度安全层面,从全球层面来看,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更多的是为抗衡美国的影响力,以及制约“疆独”势力的发展。^①如果印度核试验决策的动因是应对“中国威胁”,那么按照这个逻辑贯穿下去,由于中国的“威胁”一直都存在,印度在 1974 年核试验之后就应该一鼓作气继续试验以正式拥有核威慑力量,因此此类观点无法解释印度为什么又放下“中国威胁”而在等待了 24 年后再进行核试验。事实上,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印度与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都有所改善,例如中印两国先后于 1993 年 9 月和 1996 年 11 月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②此时印度做出核试验的决定,不但冲抵了之前各方为缓和关系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促使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作为报复,南亚次大陆反而有陷入核军备竞赛的危险,中国的反应虽然克制但也强烈谴责印度的核试验行为,印度进行核试验并没能改善自身的安全环境,反而使得局势逆转走向恶化。

综上所述,笔者发现关于印度核试验动因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印度国内政治因素或渲染中国等外部威胁,本文注意到印度国内政治因素带来的动因,但是在讨论印度国内政治的变化时不应该单纯强调政权更迭,而是应该对印度外交战略层面及其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进行分析,从中找寻到推动印度核试验的互动机制。笔者认为印度核试验最大的动因在于战略层面,印度核试验的目的在于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国际地位的认可,因此应着眼于研究其国家实力和相应的国际地位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印度外交中,争取获得大国地位是其国际政治和外交中的首要议题,因此必须把印度核试验动因放入印度追逐大国地位的整体外交考虑中,从印度大国外交与国际体系主导国的互动层次出发,深入解析印度核试验的

^① Kanti Bajpai, “Strategic threats and nuclear weapons: India, China and Pakistan,” in M. V. Ramana and C. Rammanohar Reddy, eds., *Prisoners of the Nuclear Dream*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2003), pp. 36–39.

^② 前者协定文本可参见 <http://www.fmprc.gov.cn/ce/cein/chn/zygx/zywx/t753019.htm>; 后者协定文本可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1/11/content_233680.htm (访问时间: 2013 年 7 月 12 日)。

动因，才能有助于学界更好地了解印度核计划的历史和现状，以理解和把握中印关系未来走向。本文力图通过国家“自尊—攻击行为”的分析框架，构建关于印度国内政治因素与国际因素之间的互动机制。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印度进行核试验的动机在于维护国家自尊和争取国际地位；虽然核试验并不必然增加国家实力，但的确能够传递关于国家实力的信息，有助于弥合印度对国家实力的判断与外界判断之间存在的差距；核试验的技术水平和成本影响信号传递效果，高水平核试验释放关于国家实力的可靠信号。

二 基于自尊—攻击行为的分析框架

社会心理学对自尊的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和群体两个水平，学术意义上的国家自尊概念是否存在和是否合理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关于国家与自尊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强调国家是服务于个体的利益和需求的，从而确保它们的自尊。^① 此时的自尊概念强调的是民族国家内部个体的自尊。但是，民族国家的认同是由个人成员的认同构建的，个体的自我形象受到国家地位的强大影响，自尊是自由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人们的自尊与所属国家群体所拥有的自尊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国家得不到尊重，那么与之相连的个体荣誉和自尊也就无从谈起。^③ 此时，有必要把自尊与群体联系在一起，因为个体自尊受到群体自尊的影响，个体荣誉和自尊的内在要求会使得其所属的群体应当为个体的认同、普遍的尊严和免受歧视、仇恨和压迫做出贡献，由此

^① Isaiah Berlin 研究并揭示了自尊与民族主义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受压迫民族或阶级谋求认可，它们认为外部的统治是侮辱，使得尊严受损，蒙受屈辱。参见 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Henry Hardy ed., *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Hogarth Press, 1979); Henry Hardy ed.,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New York: Knopf, 1991)。

^② 1993年，Berlin的学生 Yael Tamir 在其著作 *Liberal Nationalism* 中论证认为一个安全的、受尊敬的富强国家下，个体的福祉也得以张扬，因此个体把自己的自尊与福祉与共同体内其他成员和共同体本身的成败联系起来。Yael Tamir, *Liberal Natio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③ Will Kymlicka,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得出的论断是只有所在的国家得到尊重,个体才能拥有自尊。^①自由主义的内在要求就是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尊重也意味着对人所在的环境和认同的尊重,因而对国家的尊重就显得尤其重要。^②约翰·罗尔斯在其著作中直接提出了“国家自尊”的概念和重要性,他引用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名言,认为民族是由有共同语言和共向历史记忆的群体组成的,民族(而不是国家)拥有道德属性,因此拥有自豪感和荣誉感,民族只有在相应自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能唤起对于共同的利益和文化以及所取得成就的共同认可。^③

因此,本文力图通过传播学的社会心理学传统构建关于印度核试验动机的分析框架。传播学的社会心理学传统起源于社会心理学,是传播学中影响极大的学术传统之一,核心思想是把行为体当作“社会人”加以研究,关注的主题是行为、个体特征和产生某种行为的认知过程。^④笔者认为,自尊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可以较为有效地解释印度核试验的动机。^⑤长

^① Avishai Margalit and Joseph Raz,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87, No. 9, 1990, pp. 439–461. Avishai Margalit 和 Joseph Raz 认为自尊与群体之间的联系是如此显而易见,根本就无须证明。Kai Nielsen 在论证民族自治问题时也引用了自尊概念,国家认同给予成员生活的意义,决定后者的自尊、归属感和安全感,后者这些属于人类的基本价值所在。Kai Nielsen, “Cultural Nationalism, Neither Ethnic nor Civic,” in Ronald Beiner ed., *Theorizing Nationalism* (Albany: SUNY Press, 1999), pp. 119–130.

^② Neil MacCormick, “Is Nationalism Philosophically Credible?” in William L. Twining ed., *Issues of Self-Determination* (Aberdeen: Aberde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总体来看,众多文献研究表明自尊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但关于自尊概念的讨论需要进一步的论据支撑。相当部分的研究都是关于被压迫国家的例子,即自尊受到损害的国家例子,但是相关学者并不认为自尊概念只适用于或大部分是与被压迫国家相关,理由在于无论国家安全与否,个体获得自尊都是非常重要的,引用最多的例子包括魁北克、巴勒斯坦、库尔德等。尤其是在魁北克的例子中,个体的权利都得到充分保障,没有面临歧视或屈辱,没有被强迫讲另一种语言,领土也无被占领的威胁,作为一个民族的权利也得到充分保障,包括语言权和极大的自治权,其他的例子还包括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义例子。

^③ John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④ 参见(美)斯蒂芬·李特约翰、凯伦·福斯《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第49页。

^⑤ 20世纪80年代,关于自尊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其中关于自尊与攻击、被攻击行为的关系就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William James 早在1890年的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中就定义自尊=成功/抱负水平,即个体对于自我价值的感受取决于实际成就与潜在能力的比值。攻击性行为可定义为有意伤害别人且不为社会规范所许可的行为。参见章志光《社会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第317—344页。

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低自尊容易导致攻击，但此结论并没有确凿的理论模式或实验证据加以证实。^① 有心理学家在实证研究了 1000 多个澳大利亚孩子的欺负行为的自我报告后得出相反的结论：受欺负者通常具有较低的自尊，表现出较强的自卑感。^② 经验数据证明，长期以来大家认为低自尊易导致攻击行为的看法是错误的，而认为高自尊导致攻击行为显然也过于草率，重要的是从高自尊人群中区分出易发生攻击行为的群体，即自恋和不稳定的高自尊群体，即外界对高自尊者凸显自身优越性的特质进行公开质疑和反驳时，其攻击行为容易发生，此时的攻击行为表现为捍卫自尊的手段，也就是说自恋和不稳定的自尊可以极为有效地预测攻击行为。^③ 关于这种自尊和攻击的关系，可以从理论上解释为当自尊受到威胁时，为反抗对自我的破坏和怀疑，个体将采取攻击作为捍卫手段。

自恋和不稳定的自尊导致攻击行为的发生说明了自尊与攻击行为的因果关系，即从施动者层面分析了攻击行为发生的原因。反过来也可以通过社会心理学框架下的归因理论，即通过实际发生的行为来推断行为的原因。在很多情况下，行为的发生与解释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既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行为，各种不同行为也可被解释为源于同一个原因，当然，同一行为也可能源于多个不同的原因，因此，需要在传播的过程中解决这些模棱两可的问题。归因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类问题，

① 早期很多学者以此结论为前提进行研究，例如 Ervin Staub, *The Roots of Evi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reprint edition; Jack Levin and Jack McDevitt, *Hate Crime*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3), 但都缺乏实证依据。后来有学者曾发表观点认为有暴力倾向的母亲往往是低自尊者；还有一种说法是缺乏自尊的人通过暴力的形式来得到自尊，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暴力也可看作是提高自尊的一种手段。但是很多研究发现拥有自我提升精神的大多是高自尊者而非低自尊者，低自尊者是较缺乏自我提升精神的。Roy F. Baumeister et al., "Relation of Threatened Egotism to Violence and Aggression: The Dark Side of High Self-esteem,"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103, No. 1, 1996, pp. 5-33.

② Phillip T. Slee and Ken Rigby, "The Relationship of Eysenck's Personality Factors and Self-esteem to Bully/Victim Behavior in Australian School Boy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 14, Issue 2, 1993, pp. 371-373.

③ Roy F. Baumeister et al., "Relation of Threatened Egotism to Violence and Aggression: The Dark Side of High Self-esteem," pp. 5-33.

帮助我们从行为及其结果中推导出行为的意图和动机。

海德从通俗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归因理论。^① 伯纳德·韦纳进一步发展了归因理论的三个主要论点: 第一, 个体的性格差异和成败经验等影响着他的归因; 第二, 个体对前次成就的归因将会影响到其对下一次成就行为的期望、情绪和努力程度等; 第三, 个体的期望、情绪和努力程度对成就行为有很大的影响。^② 社会判断理论进一步发展了归因理论, 认为在归因过程中拥有的信息越多, 对该行为所做出的推论的对应性就越高; 一个行为越是异乎寻常, 则观察者对其原因推论的对应性就越大。该理论据此提出了影响对应判断的三个因素: (1) 非共同性结果。它是指所选行动方案有不同于其他行动方案的特点。(2) 社会期望。当一个人表现出符合社会期望的行动时, 我们很难推断他的真实态度。但是当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社会期望或不为社会所公认时, 该行为很可能与其真实态度相对应。(3) 选择自由。如果我们知道某人从事某行动是自由选择, 我们便倾向于认为这个行为与某人的态度是对应的。如果不是自由选择的, 则难于做出对应推论。^③

^① 海德认为事件的原因无外乎两种: 一是内因, 如态度、人格、能力等; 二是外因, 如外界压力、情境等。在归因的时候应坚持两个原则: 一是共变原则, 即某个特定的原因在许多不同的情境下和某个特定结果相联系, 该原因不存在时, 结果也不出现, 我们就可以把结果归于该原因。如一个人老是在考试前闹别扭、抱怨世界, 其他时候却很愉快, 我们就会把闹别扭和考试连在一起, 把闹别扭归于考试而非人格。二是排除原则, 它是指如果内外因某一方面的原因足以解释事件, 我们就可以排除另一方面的归因。如一个凶残的罪犯又杀了一个人, 我们在对他的行为进行归因的时候就会排除外部归因, 而归于他的本性等内在因素。Fritz Heider,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ew York: Wiley, 1958).

^② Bernard Weiner e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Attribution Theory* (New Jersey: General Learning Press, 1974).

^③ 非共同性结果指所选行动方案有不同于其他行动方案的特点。例如, 一个人站起来, 走去关上窗户, 穿上毛衣, 此时我们可以推断他感到凉了。单是关上窗户的行动也可能表示防止窗外噪音, 而穿上毛衣这个非共同性结果就可以使人推断这个行动是由于凉。社会期望, 即一个人表现出符合社会期望的行动时, 我们很难推断他的真实态度。如一个参加晚会的人在离开时对主人说对晚会很感兴趣, 这是符合社会期望的说法, 从这个行动很难推断其真实态度。但是当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社会期望或不为社会所公认时, 该行为很可能与其真实态度相对应。如上述参加晚会的人在离开时对主人说晚会很糟糕, 这是不符合社会期望的行为, 它很可能反映出行动者的真实态度。选择自由, 即如果我们知道某人从事某行动是自由选择的, 我们便倾向于认为这个行为与某人的态度是对应的, 如果不是自由选择的, 则难于做出对应推论。Muzafer Sherif and Carl I. Hovland, *Social Judgmen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根据以上理论启示，在研究印度核试验的动因时，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一：对于自身实力抱有高自信，而且国家自尊不稳定时，容易出现攻击行为，印度核试验攻击行为表现为捍卫自尊的手段。

研究假设二：在国家抱负不变的情况下，国家自尊的不稳定程度与攻击行为的强度成正比。

研究假设三：印度前后两轮核试验的信号传递效果不同，核试验技术水平反映实力，成本反映决心，实力和决心影响信号传递效果。

根据威廉·詹姆斯关于自尊的经典定义，自尊决定于潜能的实现与自以为的潜能之间的比率，个体的抱负是分母，成功是分子，因此自尊 = 成功/抱负。依照这一公式，在自己看重的领域认为自己有能力或事实上取得了成功属于高自尊型；反之，在自己看重的领域缺乏能力或遭受失败则属于低自尊型。因此参考以上定义，本文将印度国家自尊定义为印度国家潜能的实现与自我判断的潜能之间的比值，即印度的国家抱负是分母，国际地位是分子，因此印度的国家自尊 = 国际地位/国家抱负，即印度对于自身价值的感受取决于国际地位与其认定的自身国家实力的比值。印度属于高自信和自尊不稳定类型国家，原因在于印度认为在国际地位竞争中自己是有能力的竞争者，即高自尊型，但是遭国际体系及主导国忽视或轻视，又属于低自尊型，即构成了本文所指的不稳定国家自尊类型。印度对自身国家实力的判断和外界判断之间的差距，导致印度认为自身实力与国际地位之间并不对称，这种高自信与不稳定自尊易导致攻击行为的发生。这种行为表现为有意挑衅国际社会且从事不为国际规范所许可的行为，印度选择的是核试验。

正如前文的自尊—攻击行为理论所展示的，攻击行为也可以有很多方式，这里的攻击行为的表现方式是印度进行核试验，因此需要说明印度为何选择进行核试验作为挑战方式。对于 21 世纪的国际社会来说，通过核能力来获得大国地位是非常不理性的，对于美国来说更是如此，例如在印度进行核试验后有记者问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印度成为核国家是否意味着增加了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机会，奥氏反驳说“印度人是

在开玩笑吧?”^① 因此,我们必须从研究对象的政治背景和战略文化出发,找出看似不理性行为背后的理性因素和动机。对于印度政府和印度国民来说,核武器就是通向大国地位的通行证。印度的一位前国防部长曾说,“核武器是使一个国家得以在宴会头桌吃饭的东西”,以为拥有核武器就拥有了大国地位的“核武器情结”在印度有着巨大的影响力。^② 长期以来,印度精英阶层和公众舆论强调拥有核武器与大国身份认同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在他们看来成为世界大国的首要条件就是成为核国家。

核梦想是印度大国梦想的一部分,通过宣扬核能力实现大国地位在印度国内有着长久的影响力。在印度还没有获得独立以前,尼赫鲁就表达了他的大国思想,指出“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是不能打动我的,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③ 虽然在尼赫鲁时代,印度在国际领域表现出非凡的影响力,但以当时印度的实力,要成为世界有影响力的大国的客观条件显然还不成熟。在尼赫鲁执政的 17 年中,在他的战略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核战略传统有三个方面:对发展核武器的必要性表示怀疑; 强烈支持没有偏见的全面核军控与核裁军; 不关闭将来发展核武器的大门。^④ 早在 1948 年印度就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开始了追求核国家之路,印度的核计划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过加拿大、美国和俄罗斯(苏联) 等国的帮助。1954 年,印度首先提出缔结全球范围的禁止核试验国际条约的倡议。1960 年,印度在加拿大的帮助下建立了希罗斯反应堆,为印度核武器计划初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68 年,印度拒绝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上签字。1974 年 5 月,印度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显示自己

^① Evan Thomas, “Ground Zero,” *Newsweek*, May 25, 1998, <http://www.highbeam.com/doc/1G1-20806567.html> (访问时间: 2013 年 7 月 12 日)。

^② 汪诒 《错误时间的错误行动—印度核试验述评》,《世界知识》1998 年第 11 期,第 4 页。

^③ (印)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印度的发现》,齐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第 57 页。

^④ Rajesh M. Basrur, “Nuclear Weapons and Indian Strategic Cultur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8, No. 2, 2001, p. 186.

已具备制造核爆炸装置的能力。在 1974 年爆炸第一个核装置后，印度历届政府都只是奉行“保留核选择”的政策，即将核能力保持在“模糊状态”下，即坚持不放弃核选择，外交上不承担义务，以非公开的方式发展核武器而又不宣称自己是核国家。^① 印度的核梦想自此之后一直在坚定地推进，直到 1998 年 5 月核试验之后，印度正式向国际社会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印度已经掌握核武器制造技术，成为一个事实核国家。

笔者认为通过对构建关于印度国家实力不同判断的分析框架（参见图 1），可以有效解决印度核试验动机分析中存在的研究困境。无论是印度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还是印度与中国的国际竞争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原因，即印度对自身实力的判断与外部对其实力的判断之间存在差距。印度国内民族主义高涨的主要原因是对其国际地位不满，强调“中国威胁”也是因为在国际地位竞争中中国的吸引力和国际地位高于印度。这种对自身实力的高自信与其国际地位的不对称导致印度的国家自尊受到损害，即当印度在国际舞台不断遭受忽视，国家实力并不被国际社会所认可时，攻击行为容易发生，此时的攻击行为表现为捍卫自尊的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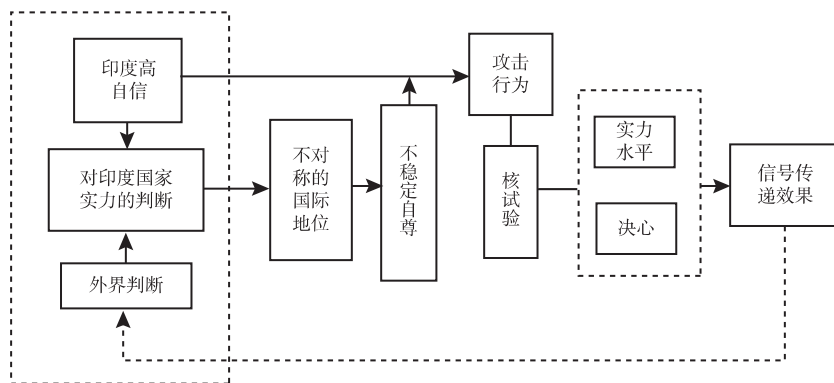


图 1 自尊—攻击行为互动机制

^① 马加力 《印巴核试验及其对南亚安全态势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1998 年第 7 期，第 20—21 页。

正如下文将论述到的,从 1974 年和 1998 年核试验时间点的选择上可以看出这种不稳定国家自尊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联性。

三 基于 1974 年和 1998 年核试验的实例论证

在印度看来,核实力是通向世界大国的必备能力,核实力虽然并不必然增加国家实力,但可以向外界有效传达关于印度国家实力的信息,这也是印度选择通过核试验来传达信息的原因所在。正如下文即将论证的,印度对自身实力的判断与外部对其实力的判断之间存在差距,这种高自信与其国际地位的不对称导致印度国家自尊的不稳定,引发印度通过核试验这种攻击行为向外界宣示实力以捍卫国家自尊和争取国际地位。在准备本文议题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对 1974 年印度首次核试验的研究材料和成果相对较少,这与该次核试验的效果和影响力偏弱有关。在对印度核战略的研究中,笔者认为 1974 年首次核试验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注意到首次核试验与 1998 年系列核试验具有重要的比较研究价值,下文将结合 1974 年和 1998 年印度核试验情况对此进行论证。

本文认为印度前后两轮核试验的攻击强度和国家自尊的不稳定程度是与攻击行为的强度成正比的。如前文所述,核试验行为是由印度对国家实力的高自信和不稳定的自尊所导致的,根据“国家自尊 = 国际地位/国家抱负”的定义公式,在国家抱负不变的情况,国家自尊的不稳定程度与国际地位落差成正比:^① 国际地位落差越大,国家自尊的不稳定程度越大;国家自尊的不稳定程度越大,攻击行为的强度越高。印度的国家类型在 1974 年和 1998 年前后没有发生改变,即属于不稳定自尊类型。但正如

^① 简要证明如下: 国家自尊损害 = 实际国家自尊 - 期望国家自尊, 由于期望国家自尊 \geq 实际国家自尊, 国家自尊损害 ≤ 0 , 根据国家自尊 = 国际地位/国家抱负, 那么国家自尊损害 = (实际国际地位/国家抱负) - (期望国际地位/国家抱负) = (实际国际地位 - 期望国际地位) / 国家抱负 = 国际地位落差/国家抱负 即当国家抱负不变时, 国家自尊损害与国际地位落差成正比。

前文所述，经过 24 年的经济发展和核实力的秘密发展，印度对自身国家实力更加自信。不过，这种增长了自信对应的现实是印度的大国地位仍不被国际社会及主导国家所认可，印度的国际地位落差更大，因此 1998 年核试验所展现的攻击强度要高于 1974 年。本文认为通过比较印度政府对前后两轮核试验的不同表态和期望，可以展现出前后两次攻击行为的强度不同，即印度政府决策核试验和之后的表态可论证本文的研究假设二。正如下文即将论证到，这种攻击强度也在 1998 年系列核试验的策划过程和展示的的决心和实力方面，即从结果层面再次得到印证。

首先谈一下印度对自身国家实力的判断。印度是南亚次大陆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6 年中，印度军队的规模从 17.5 万人增至 200 万人，并且建立了机械化和现代化部队，尤其是组建了现代海军和空军。庞大的军需和战区物资供应刺激了印度工业的发展。^① 虽然近代历史上经受了英国的长期殖民统治，但在印度独立后，其对外战略充满了战争与冲突：自 1947 年独立以来，印度先后对巴基斯坦发动了三次战争，第三次印巴战争最终导致巴基斯坦肢解，东巴脱离巴基斯坦，成立了孟加拉共和国；挑起中印边界战争；长期以来在喜马拉雅地区国家实行强权政治，吞并锡金王国，不丹成为其事实保护国，长期干预尼泊尔内政外交；出兵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公然干涉他国内政。从印度的对外行为可以看出，印度对国家实力是拥有高度自信的。

印度对国际地位的渴望则反映在其大国梦想方面。尼赫鲁时代正是两极格局下美苏争霸时期，尼赫鲁凭借印度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外交手段开展大国外交，印度在国际领域表现出非凡的影响力，但此时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政治影响力方面，以当时印度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要成为有世界影响力大国的客观条件并不成熟。如果说尼赫鲁时代的大国外交在与中国的边界冲突后让印度回到现实，那么后来的经历更是加重了

^① 林太 《印度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第 326 页。

印度感受到的外部对其国家自尊的伤害。在 1971 年策划第三次印巴战争时，印度明白无法在西巴、东巴方向和中印边界三条战线同时进行战略部署，这一处境直接促成同年 8 月印苏条约的签订，该条约因苏联的撑腰而对当时的印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中国并没有介入印巴冲突，而美国却派遣以核动力航母“企业”号为首的舰队驶入孟加拉湾向印度施压，这被印度视为新的“炮艇外交”，对印度的国家自尊造成极大的伤害，尤其是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印度发现让自己受到牵制、无法放手行事的三个国家，即苏联、美国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共同特征是属于核国家，这个事件使印度又一次被动地意识到核威慑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印度拥有独立的核威慑的决心。后来的消息显示，1972 年印总理英迪拉·甘地就指示在两年后（1974 年）进行核试验。^① 1974 年 5 月 18 日上午 8 点 5 分，印度在西部拉贾斯坦邦的博克伦地区进行了首次核试验，代号为“笑佛”。

对于 1974 年的核试验，印度政府宣称这是一次“和平核爆炸”，印度原子能委员会则说印度“无意生产核武器”，英迪拉·甘地告诉新闻界“没有任何兴奋的感觉，它是我们正常的研究和计划，但是我们坚定地承诺只和平利用原子能。”^② 据称此次核试验当量为 1.2 万吨，美国情报机构后来估算此次核试验的实际当量在 4000 吨至 6000 吨之间，^③ 对于印度强调核试验的所谓“和平性”，美国政府公开加以驳斥，强调加上“和平”二字并不能改变核爆炸的军事目的。^④ 后来，在 1997 年的一次演讲中，时任印度原子能计划负责人拉贾·拉马纳博士表示“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时测试的就是原子弹，就如手枪无论瞄准人还是地板，它仍是一把手枪一样，核爆炸就是核爆炸，我的意思是说那次核试验根本就不

① 张力 《印度的核政策与核战略》，《南亚研究季刊》2000 年第 2 期，第 65 页。

② George Perkovich, *India's Nuclear Bomb, 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178.

③ 夏立平 《论印度核政策与核战略》，《南亚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15 页。

④ Brahma Chellaney, *Nuclear Proliferation: The U. S. -Indian Conflict*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1993), p. 45.

和平。”^①

尽管印度不承认 1974 年的“和平核爆炸”试验具有军事含义，否认有发展核武器的意图，但事件本身发出的声音则是：印度不能容忍其他大国的漠视，核大国不能随意把它们的影响施加于印度。从外交手段看，印度之所以强调所谓“和平目的”，有其外交意图：一是可以避免招致西方国家的制裁；二是避免改变自己的和平核形象而影响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声望；三是避免给予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制造借口；更重要的是向世人表明印度已经掌握了核技术，具备了生产核武器的能力，而英迪拉·甘地也相信印度会因此“受到大国的尊重，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声望也会提高”。^②事实也再次印证印度发展核武器所强调的“中国威胁”不过是托词，因为 1974 年已经是中国制订核计划后十年；而印度在此之后二十余年没有继续发展核武器的事实也说明，印度进行核试验的主要动机不在于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否则的话印度应该是趁热打铁，继续发展核武器并迈入核国家行列，因此印度进行核试验的动机更多的是提高本国政治地位和扩大国际影响力。^③

再来分析一下 1998 年前后的情况。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后，印度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有所提高，如果说印度 1974 年前对国家实力的高自信被现实打破，那么 1998 年前后印度对国家实力的高自信则是有客观事实支撑的，从表 1 可以看出，印度经济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相对快速发展，而且从事后的现实来看，自 1974 年第一次核试验以来，印度科学界一直在改进核技术，核技术已经发展到了比较高的阶段，印度的国家自信是建立在增长了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基础之上的。

^① Raj Ramanna, “Indi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s: Smiling Buddha 1974,” <http://nuclearweaponarchive.org/India/IndiaSmiling.html> (访问时间: 2013 年 7 月 12 日)。

^② 孙士海《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 279 页。

^③ John W.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 320.

表 1 印度各个计划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

年 度	GDP 年均增长率%	年 度	GDP 年均增长率%
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1—1956	3.7	第六个五年计划 1980—1985	5.4
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6—1961	4.2	第七个五年计划 1985—1990	5.6
第三个五年计划 1961—1966	2.8	两个年度计划 1990—1992	3.2
三个年度计划 1966—1969	3.9	第八个五年计划 1992—1997	6.6
第四个五年计划 1969—1974	3.4	第九个五年计划 1997—2002	5.7
第五个五年计划 1974—1979	4.9	第十个五年计划 2002—2007	7.6
一个年度计划 1979—1980	-5.0	第十一个五年计划 2007—2012	7.9

资料来源: Government of India, *Economic Survey 2011 - 2012*, p. A - 4, <http://www.indiabudget.nic.in> (访问时间: 2013 年 7 月 12 日), 转引自吕昭仪主编《印度国情报告 (2011—2012)》,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第 71 页。

1998 年的国际形势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迅速发展,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影响力不断扩大。虽然早在几年前印度就表达了渴求跻身其中的愿望, 但始终未能如愿, 使印度倍感失落; 亚欧首脑会议也没有把自认为应该成为成员的印度包括在内, 更使它十分恼火; 而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事, 则更是遥遥无期。在印度看来, 要想自身的大国地位得到世界认可, 必须拥有核武器; 要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也必须拥有核武器; 中国之所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就是因为中国拥有原子弹, 而印度尽管拥有核能力, 只是因为没有公开地拥有核武器, 就被置于不公正的地位, 就不被国际社会重视。印度军方智囊人物公开抱怨说 “印度人的普遍印象是, 美国不理睬印度, 而把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中国。”^① 这种巨大的失落感使印度感到拥有核武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印度认为美国主导的国际军备控制和裁军议程执行的是双重标准, 一重标准是针对美国及其战略伙伴, 另一重标准是针对其他国家, 使得军备控制和裁军议程给后者带来压力和困扰。^② 当时印美关系发展缓慢, 印度在拥核和强国之路

① 美国《洛杉矶时报》1998 年 5 月 17 日。

② Ashok Kapur, *Pokhran and Beyond: India's Nuclear Behaviour*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80.

上颇受牵制，印度因此认识到虽然对自身国家实力的自信提高了很多，但是印度的大国地位仍然没有得到认可，倍感国家尊严受损，从而下决心加入核俱乐部也就不足为奇。

印度对 1998 年系列核试验时间点的选择也反映了发起挑战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战略目的。对印度科学家来说，印度核技术提高了，新的设计需要进行核试验加以检验，因此试验是绝对需要的，但是能否进行试验的决策权在政治家手里，将由他们决定是否需要在国际社会禁止核试验之前进行一系列试验。^① 1995 年 5 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得到无限期延长。在印度看来，条约的无限期延长就是要永久地保护 5 个核国家手中的核武器，而这 5 个核国家正在致力于改进其核武库的现代化计划。^② 因此，印度对条约草案及签署附加了条件，从而保留了印度核试验选项，以便在必要时可以通过抗议既有核国家的歧视性机制，为保留核试验选项和最终进行核试验寻找空间。^③ 此外，90 年代中后期印度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立场也发生了转变。印度认为，1996 年 6 月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决议草案违背 1993 年联合国大会的相关决议，而且未能解决印度所关心的问题。1996 年 7 月，国际社会提出一项新的决议草案（尤其是草案第 14 条规定条约在各个国家必须限期签署的前提下方能生效），加大了印度对条约的不满，印度国内担心《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将永远关上印度核选择的大门。正因如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成为促使印度下定决心进行核试验的“最后一根稻草”。^④ 该条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印度加快了公开核试验的脚步。

核试验当天，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写信给美国总统，信中写道“我们

① Eric Arnett, *Nuclear Weapons and Arms Control in South Asia after the Test Ban*, SIPRI Research Report No. 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7.

② (印) 贾斯旺特·辛格 《印度的防务》，胡仕胜等译，中国人民解放军 56279 部队印，2004，第 366 页，转引自刘思伟《印度在国际核不扩散问题上的立场与政策选择》，《南亚研究季刊》2012 年第 4 期，第 99 页。

③ Eric Arnett, *Nuclear Weapons and Arms Control in South Asia after the Test Ban*, SIPRI Research Report No. 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4.

④ Ashok Kapur, *Pokhran and Beyond: India's Nuclear Behaviour*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03.

在边境上一直面对着一个公开的核武器国家，它在 1962 年曾对印度发动过武装入侵。”^① 印度将核试验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威胁，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反映了印度大国战略的特质，即强调相对更远期的中国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巴基斯坦威胁。这也是在传达这样一个消息：印度核试验的决策是从大国政治的战略层面出发的，即在决策中大国战略的分量大于现实的安全考虑。贾斯旺特·辛格时任瓦杰帕伊总理的国防和外交事务高级顾问，其于 1998 年印度核试验后在《外交事务》撰文为印度的核政策辩护，认为 1995 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歧视性的，而且在 5 个核国家总计已经进行了超过 2000 次的核试验之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才开始开放签署，其他国家的核选择权受到严重损害。该文还提出一连串问题“如果 5 个核国家拥有核武器可以增进国际安全，为什么印度拥有核武器就会威胁国际安全呢？如果 5 个核国家的核武器可以成为国际权力的硬通货，为什么要求印度让自己的国家实力和国家安全贬值呢？”^② 与 1974 年印度宣称进行了一次“和平核试验”不同，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这次宣布“印度已经成为一个核武器国家”，印度民众聚集在总理府前高喊口号，庆祝国家一夜之间赢回尊严。^③

应当注意到，在冷战时期，印度曾经自诩和被认为是不结盟运动领袖和政治大国，而且客观地看，相对于印度的经济规模和军事实力，作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的印度在国际事务上确实具备相当的政治影响力。但随着冷战结束，不结盟运动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印度的国际地位逐渐式微，印度开始调整外交策略，一方面积极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另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在国际政治舞台寻求国际地位，希望借助核能力成为

① Steven Lee Myers, “Nuclear Anxiety: The Policy; Clinton To Impose Penalties On India Over Atomic Test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3, 1998, <http://www.nytimes.com/1998/05/13/world/nuclear-anxiety-policy-clinton-impose-penalties-india-over-atomic-tests.html> (访问时间: 2013 年 7 月 12 日)。

② Jaswant Singh, “Against Nuclear Apartheid,”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8,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54391/jaswant-singh/against-nuclear-apartheid> (访问时间: 2013 年 7 月 12 日)。

③ Russell Watson, “Explosion of Self-Esteem: India Tests Nuclear Weapons,” *Newsweek*, May 25, 1998, <http://www.highbeam.com/doc/1G1-20806569.html> (访问时间: 2013 年 7 月 12 日)。

国际上的大国。因此，以上分析论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一，即印度对自身实力的判断与外部对其实力的判断存在差距，高自信与不稳定国家自尊易引发攻击行为。这种攻击行为具体表现为印度挑战国际规范的行为，而核试验对于印度捍卫自尊、争取国际地位来说，无疑是最有效也最符合印度战略目标的方式。

四 基于核试验信号传递影响因素及效果的对比论证

核试验能有效传递关于国家实力信号的原因在于核试验水平反映了一国的综合实力，以及核试验潜在的经济和政治成本反映了一国的决心。国力弱小的国家难以负担核武器研发过程的经费支出，而且一旦核武器研发成功，后续的投送能力、预警能力和生存能力开发都需要强大经济后盾的支持。在美国的强力推动下，冷战后的国际核不扩散体制更加不利于小国从国外获得相关的核技术、核材料以及核设备，发展核技术的成本越来越高，后续可能还要面临的国际孤立和经济制裁等。如果进行核试验的成本与国家实力无关，那么核试验就不可能起到信号传递作用，因为低实力国家会模仿高实力国家的行为而进行核试验。因此，下文将力图通过对印度 1974 年和 1998 年核试验的分析和信号传递结果对比来论证研究假设三，同时论证过程可以为本文的研究假设二从核试验的结果和影响方面提供佐证。综合来看，印度 1998 年系列核试验中展现的攻击强度显著高于 1974 年，国家的实力和决心在影响信号传递效果。

第一，1998 年 5 月印度进行的系列核试验的技术水平所反映的综合实力。正如前文所注意到的，印度早在 1995 年就准备进行核试验，但因美国的间谍卫星和情报部门发现了有关迹象并公开披露，印度迫于压力才中止该行为。1998 年进行核试验准备时，印度吸取了 1995 年的教训，为躲避美国卫星的监控和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动用了各种外交和技术手段，如一方面不断向美国保证不发展核武器，另一方面又在印度东部摆出进行导弹试验的姿态，吸引美国间谍卫星的注意，掩盖其在西部进行核试验的准备；

在核爆炸前几天，试验场周围实行绝对的无线电静默；甚至在核爆炸后，试验场向瓦杰帕伊报告试验成功时，也是用“佛祖笑了”作为暗语。^① 时任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的理查德·谢尔比强烈指责中央情报局“这是情报搜集工作的巨大失败，十几年来最大的情报失误”。^② 从某种程度上说，印度能避开美国的监控和情报网成功进行核试验，说明其进行核试验的决心之大，整个过程也表明印度如今的核计划能力和水平已今非昔比。

关于此次系列核试验展示的技术水平，根据印度公布的资料，1998 年 5 月 11 日的试验包括一个爆炸当量为 1.2 万吨的裂变装置、一个爆炸当量为 4.3 万吨的热核装置和一个爆炸当量为 200 吨的核装置；5 月 13 日试验的是两个当量分别为 500 吨和 300 吨的核装置。^③ 印度在 48 小时内进行了 5 次核试验，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一般情况下只有在一次核试验获取并分析试验数据之后才改进和安排下一次试验，而印度是一次就安排了 5 次试验。这样做一是为了避免遭到多次（而且是一次比一次升级的）谴责，二是为了获取政治效应。^④ 这一系列爆炸显示印度掌握的核技术水平超过了外界的估计，外界的估计是印度掌握了第一代核武器，但这次核试验表明印度当时至少已掌握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核武器的制造技术，涵盖了低当量战术核武器、全尺寸裂变武器和热核武器（氢弹），此外还为印度未来进行零当量的次临界试验提供了关键的数据。^⑤ 根据后来印度国防部的消息，通过 5 月进行核试验时所得到的数据，印度

① 张晓平《论美国在印度核试验事件中的情报失误》，《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8 年第 21 卷第 6 期，第 104 页。

② “Sen. Shelby Comments on ‘Colossal Intelligence Failure of the Decade’,” May 12, 1998,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intell/library/news/1998/05/prsrs117.htm> (访问时间: 2013 年 7 月 12 日)。

③ 刘华秋主编《军备控制与裁军手册》，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0，第 196 页。

④ 夏立平《论印度核政策与核战略》，《南亚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15 页。

⑤ John Burns, “Nuclear Anxiety: The Overview; India Detonated A Hydrogen Bomb, Experts Confirm,”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9, 1998, <http://www.nytimes.com/1998/05/18/world/nuclear-anxiety-the-overview-india-detonated-a-hydrogen-bomb-experts-confirm.html> (访问时间: 2013 年 7 月 12 日)。

今后有能力进行次临界核试验，也就是说印度已具有在不进行核爆炸试验的情况下通过次临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的能力。^① 此次系列核试验的水平远超过 1974 年时的水平，印度核技术水平超过外界预期。

第二，印度核试验付出的经济和机会成本中所体现的决心。印度核试验以后，受到了世界约 152 个国家的强烈反对或谴责。^② 美国、日本、加拿大等一些国家以及一些国际机构纷纷宣布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实行经济制裁，或冻结援助，或取消贷款。据报道，从账面上计算，美国公布的对印度制裁清单就涉及 207 亿美元；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也宣布中止对印度的贷款，涉及的资金数目更大，截至 1998 年，印度共向上述三大机构借款 440 亿美元，主要用于 84 个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美英法德意日加俄八国领导人 5 月 15 日通过经济首脑会议发表声明，对南亚地区增长的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扩散危险表示严重关切，要求印度同其他国家不再进行进一步实验和部署核武器，要求印度无条件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③

对于美国的反应，从美国国内法层面来讲，根据《1994 年防止核扩散法》（以下简称《防止核扩散法》），即格伦修正案的规定，禁止美国向核试验国提供经济援助，而且美国的制裁是自动生效且几乎是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因此，美国迅速启动了对于印度的制裁，制裁来自两方面：一是根据《防止核扩散法》所启动的关于经济和军事援助、银行信贷及出口许可证的制裁；二是行政当局所决定的政治、军事制裁。1998 年 5 月印度核试爆后，克林顿总统首次援引《防止核扩散法》宣布将对印度采取严格的制裁措施，停止对印度除人道主义以外的一切援助。具体来说，美国的制裁措施包括：终止所有有关军事出口许可证的颁发和一切军事援

① 路透社新德里 1998 年 9 月 21 日电。

② Strobe Talbott, "Dealing With the Bomb in South Asia,"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9,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54802/strobe-talbott/dealing-with-the-bomb-in-south-asia> (访问时间: 2013 年 7 月 12 日)。

③ 曹永胜、罗健、王京地《南亚大象：印度军事战略发展与现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第 184 页。

助, 停止美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供的一切贷款、信贷、信用担保和其他财政援助, 禁止所有的美国银行向印度政府提供出口信贷, 禁止向印度出口一切需要特别许可证的商品和技术, 行政当局施加的制裁则主要是在限制高层访问和军事合作方面。总体来看, 印度核试验所展现的实力和决心, 1998 年系列核试验远超 1974 年核试验, 展现出的核技术水平更是不同。高水平核试验传达出印度国家实力的信息被国际社会尤其是主导国美国所接受, 这种信号传递效果也符合印度的期望。

本文注意到, 由于核试验的技术水平和成本影响信号传递效果, 印度 1974 年和 1998 年核试验的信号传递效果也不同。前者基本没有产生太大反响, 国际社会和当时的主导国都没有做出强烈反应, 这反映出由于国家实力过低, 印度核试验传递的关于国家实力的信号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1998 年核试验的技术水平和对机会成本的承受能力反映出印度的实力和决心, 实力传递信号遭遇强烈国际反应也说明信号传递效果很好, 随后印度与主导国在核合作等系列问题上的突破则证明印度的国家实力开始得到认可, 信号传递效果非常明显。

从印度的角度来看, 即使核试验并不必然提高国家实力, 也可以通过信号传递的作用使得主导国将印度的地位提升到主导国对外战略的合适位置, 从而提升印度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比如, 作为一个为主导国所认可的大国, 印度的国家实力提高后获得了相应的国际地位, 这也将提高印度的国家自尊, 印度在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程度和效率方面都会有所提高。如果没有适当的信号传递, 实力已经得到提升的印度在无法得到主导国适当认可的情况下, 与主导国的关系可能会日益疏远并走向主导国竞争对手的外交体系中, 这对主导国来说是一种损失。因此, 正是因为前后两轮核试验所体现的实力和决心方面的差异, 所带来的信号传递效果也不相同。

首先看一下 1974 年印度第一次核试验的信号传递效果。为了便于前后比较, 本文主要比较美国对印度核试验的不同反应。当时正值美苏冷战对抗时期, 美国是两个超级大国之一, 是国际核议程的主要参与者和制定

者。总体来看，此次核试验的信号传递效果并不明显，美国对印度的国家实力认同没有因此发生较大改变，两国核合作并没有出现明显后退或加速。此次核试验的信号传递出现不明显效果，主要表现在核试验后印度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美国也没有做出激烈反应。从社会判断论出发，如果国际社会表示强烈抗议和反对是在印度意料之中的反应的话，那么，国际社会对印度核试验的反响之平静则出乎英迪拉·甘地及印度政府的意料，而国际社会的平静反应则更可能是与其真实态度相对应，即无论是美苏还是其他国家，都认为印度的国家实力较弱，即使进行核试验也不足以改变国际权力格局，因此也就无须对此表示态度了。的确，1974年印度的核试验对于当时印美正在进行的民用核合作项目没有产生太大影响，美国仍按计划为印度塔拉普尔建立核电反应堆提供燃料用浓缩铀，国会通过的一项反印议案也只是要求世界银行不再向印度提供低息贷款。^①印度在1974年爆炸第一个核装置以后，此后的历届政府都奉行“保留核选择”的政策，将核能力保持在“模糊状态”下，即坚持不放弃核选择，外交上不承担义务，以非公开的方式发展核武器而又不宣称自己是核国家。^②但印度的核梦想自此之后一直在坚定地推进，其努力程度外界不得而知，但从1998年5月接连进行5次核试验及其展现的核技术水平可以看出印度背后所付出的努力。

美国1978年《核不扩散法》出台的重要背景之一就是印度1974年的核试验，该法要求美国民用核能技术的受援国必须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的监管，因此美国继续向印度提供低浓缩铀面临法律障碍。1978年4月，美国核管理委员会曾否决了国务院向印度出口浓缩铀的出口许可证，但在印度威胁不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其核设施和转向苏联寻求核燃料供应的情况下，该法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直到里根政府执政后，

^① (英) 爱德华·卢斯 《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张淑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第205—210页。

^② 马加力 《印巴核试验及其对南亚安全态势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1998年第7期，第20—21页。

美国邀请法国代替美国向印度提供核反应堆用的浓缩铀，才彻底解决了国内法的掣肘。^①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没有证据显示此次核试验对于印美核合作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实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1974 年，美国就开始了与印度的民用核能合作，印度是当时美国和平利用核能项目的受益国之一，其中美国向印度继续提供核燃料是依据 1963 年美国与印度签署的《民用原子能协议》。协议规定美国帮助印度在塔拉普尔建立核电反应堆，并且为印度提供为期 30 年的燃料用浓缩铀，附加条件是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可随时进行现场核查。^② 事实上，此后印美关系有所发展，但两国关系的进展并不顺利，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两国关系都是磕磕绊绊的，以至于当时伍德罗·威尔逊研究中心出版的一本新书的名字就叫作《印度和美国：两个疏远的民主国家（1941—1991）》，横亘在两国之间的是印度的不结盟运动和与苏联的战略关系，以及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和战略伙伴关系。^③ 直到受到 1998 年印度核试验的短暂冲击之后，印美关系才开始大幅度改善。

1998 年印度系列核试验时，正是美国占据单极主导地位之时，此次系列核试验的效果也与前次明显不同。^④ 首先表现在印度的核地位很快得到美国默认。1998 年 5 月，印度宣布进行系列核试验之后，美国根据国内法对印度施加的经济制裁对印度的影响并不如核试验之初时显现的那么大，主要表现在：（1）经济制裁实际造成的损失与印度的经济规模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影响实在有限，用印度时任财政部长辛哈的话来说，

① George Perkovich, *India's Nuclear Bomb, 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178.

② George Bunn,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and its History," in George Bunn and Christopher F. Chyba, *U. S. Nuclear Weapons Policy: Confronting Today's Threats*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6), p. 109.

③ Amitava Tripathi, "Prospects of India Becoming a Global Power," *Indian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Vol. 6, No. 1, 2011, p. 66.

④ 题外话就是两轮核试验在印度的地位也不一样，1998 年系列核试验开始的 5 月 11 日成了印度的国家“技术节”（National Technology Day），每年在这个让印度人骄傲的日子里，各种荣誉和奖励向个人和企业颁发，而 5 月 18 日“笑佛”的日子则没有成为印度的节日。

美国的制裁措施只不过是印美贸易关系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小小的绊脚石”。^① 美国宣称经济制裁对印度造成的经济损失初期就将达到 206.3 亿美元，但是印度财政部的测算则表明经济制裁损失只有区区 11.4 亿美元。从一开始美国对印度制裁就是形式大于内容，对印度的影响较小，在可承受范围内。^② (2) 经济制裁执行的时间短，美国在很短时间内就开始分步取消了原本就有限的制裁。刚刚开始执行制裁不到 1 个月，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就与印度外长辛格会晤，双方认为美国充分理解印度核武化进程已不可逆转，并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印度发展核武器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在发展进一步的核威慑能力上有所自我克制。^③ 1998 年 7 月与 8 月美国两次宣布取消部分制裁，9 月参议院通过决定，允许克林顿总统将美国对印度的制裁搁置一年执行。^④ 印度核试验释放的信号传达到美国决策层面并得到了美国全面谅解，美国快速取消制裁的实际行为表明印度的核地位已经得到美国的默认。

其次，印美核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实际上，在对印度制裁自动生效后，美国国内就出现众多反对制裁的声音，而且反对意见并不局限于取消制裁，还强调美国的政策应当具有灵活性，美国政府应允许印度取得核国家地位，以此换取印度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甚至有呼吁敦促美国国会尽快通过法案，允许美国向印度转让民用核技术，全面介入印度核进程。^⑤ 在 1998 年 5 月核试验后，印度实际已获得了计算机模拟所需的必要数据，也就是说

① 《美国制裁在印引起不同反响》，《人民日报》1998 年 6 月 22 日，第 6 版。

② Charan D. Wadhva, “Costs of Economic Sanctions aftermath of Pokhran II,”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conomy*, Vol. 33, No. 26, 1998, pp. 1605 – 1606.

③ Strobe Talbott, *Engaging India: Diplomacy, Democracy and the Bomb*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pp. 3 – 4.

④ V. P. Malik, “Indo-U. S. Defense and Military Relations: From ‘estrangement’ to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Sumit Ganguly et al., *US-Indi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into the 21st Century: More than words* (Oxon: Rutledge, 2006), pp. 86 – 87. 其他主要国家对印度的制裁也很快取消，1998 年 7 月，德国已经表示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将继续，日本在切断对印度官方发展援助方面的立场也明显松动，参见 Charan D. Wadhva, “Costs of Economic Sanctions aftermath of Pokhran II,” p. 1604.

⑤ Stephen P. Cohen, *A New Beginning in South Asia*, Brookings Institution Policy Brief, 2000, p. 4.

达到了在将来进行次临界试验的要求, 技术上的进步使印度做出自愿暂停核试验的声明, 因此在 1998 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印度表示愿意谈判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① 上述反对意见后来也成为美国对印度的现实政策, 说明默认印度核地位和加强美印协作在美国政府高层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得到美国的默认和许可, 印度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地位和影响力方面都收获颇丰。

最后, 印度还在印美关系方面取得更大的收获。1999 年年底, 美国众议院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将美印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的决议; 2000 年, 美财政部长、国务卿、美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等相继访问印度, 克林顿还要求为印度额外提供 4655 万美元的双边发展援助, 事实上解除了美国对印度的经济制裁; 2000 年 3 月, 克林顿对印度进行了为期 5 天的访问 (克林顿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只进行了 5 个小时), 成为将近 20 年来第一个访问印度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访问不仅促使印美关系进一步改善, 对印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也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2001 年瓦杰帕伊访美时与小布什总统达成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下一步骤》协议成为印美关系获得突破性发展的基础。^② 美国这些对印度的善意之举, 自然得到了印度的赞赏和感激。在 2003 年 5 月初,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米什拉在纽约外国关系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就明确提出这一点 “我们必须承认, 美国是首先缓和对印度核试验所持异议的国家之一, 因为他们更了解印度的政治考虑和经济潜力。在核试验之后两年不到的时间, 克林顿总统就于 2000 年 3 月访问印度, 这是一个里程碑事件。”^③

2001 年小布什上台执政后, 印美关系急剧升温。小布什政府希望进一步发展同印度的关系, 一方面在美、印、俄三国关系中进一步拉近美印

^① 1999 年, 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美国置身于条约之外给了印度新的借口, 瓦杰帕伊声称 “既然美国不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印度人民就不会要求政府签署什么核裁军协议。” 参见曹宏、周永才主编《冷战后谁能毁灭地球》,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01, 第 114 页。

^② Harsh V. Pant “The US-India Nuclear Deal: the Beginning of a Beautiful Relationship?”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0, No. 3, 2007, p. 457.

^③ 《印度驻上海总领事馆新闻简报月刊》2003 年第 7 卷第 5 期, 第 9 页。

关系，从而为自己的全球战略体系建立又一个支点；另一方面通过对印度采取怀柔和拉拢的政策，达到挤压和牵制中国的目的。为向印度示好，美国政府在2001年2月宣布进一步放松于1998年开始的对印度的制裁措施，允许向印度出口军用直升机配件。这也是为全面解除对印制裁发出的信号。印度为了争取早日解除核试验以来受到的制裁，并期望从美国获得高技术武器，积极支持美国的反导计划。^①曾在小布什两任总统时期担任高级职务的赖斯（赖斯曾在小布什第一任期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在第二任期出任国务卿）于2000年总统大选前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的观点基本奠定了小布什任期内的美印关系基调，并成为随后小布什任期内的政策实践。赖斯认为印度具备成为大国的巨大潜力，美国不应过分强调核不扩散问题，而应该把印度作为美国的天然盟友。^②2001年的“9·11”事件对美国而言是不幸的，但对印度来说则是一个机遇，印度是最先宣布支持美国进行全球反恐战争的国家之一。

2005年3月，赖斯访问印度，提出小布什政府愿意与印度开展全方位合作，合作深度甚至超越印度政府的期望。^③随后美国政府宣布新的对印政策，致力于帮助印度成为21世纪的世界大国。第一步就是消除双方在核领域长期存在的不信任，印美关系进入飞速发展时期。^④小布什在2006年3月访问印度，宣称印美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印美伙伴关系将改变世界权力版图”。^⑤印度一直希望自身的核身份得到合法承认，《美印核协议》是小布什2006年访问印度期间与印度总理辛格共同签署的协议。该协议的最大争议在于美国可以在印度不签署《不扩散核武器

① 曹永胜、罗健、王京地《南亚大象：印度军事战略发展与现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第21页。

② 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1, 2000, p. 56.

③ C. Raja Mohan, *Impossible Allies: Nuclear India, United States and the Global Order* (New Delhi: India Research Press, 2006), p. 57.

④ "Background Briefing by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on U. S. -South Asia Relations," March 25, 2005, <http://2001-2009.state.gov/r/pa/prs/ps/2005/43853.htm> (访问时间: 2013年7月12日)。

⑤ See the US President's speech in India, March 3, 2006,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6/03/20060303-5.html> (访问时间: 2013年7月12日)。

条约》的情况下向印度提供美国的核技术和核燃料，打破了美国禁止向不接受国际监督的第三方国家提供核援助的规定。这个协议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争议，甚至连美国和印度国内对此也存在强烈争论。^① 实际上，为了绕开《1954 年原子能法》的限制，小布什政府专门就美印核合作起草并推动通过了特别修正案，并于 2006 年 12 月 18 日签署生效《2006 年美印和平利用原子能合作法案》（又称《海德法》），通过人为豁免，使得美印核合作不再受《1954 年原子能法》相关条款的制约。这一豁免行动本身体现了美国在美印核合作方面的战略考量，即为了协调印度实际拥有的核地位与现有国际核机制的内在冲突，美国不惜打破国际核机制的制约。当然，作为回报，印度同意将用于民用和军用的核设施进行分离，并签署一份附加议定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民用核设施进行安全监督；印度政府还承诺暂时中止核试验，承诺加强其核武器库的安全；印度还将努力就 FMCT 与美国进行谈判，最终停止生产可用于原子弹制造的核裂变材料。^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1974 年和 1998 年印度核试验展现的挑战强度不同。核试验所反映的实力和决心影响信号传递效果，特别是印度 1998 年的核试验消除了国际社会对印度核状态的猜测，也使得印美关系翻开新的篇章，促进了印美核合作的突破性发展。从实质影响来看，《美印核协议》不仅仅是核技术条款，还是关于世界权力平衡的重新配置，它提高了印度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五 结论

总体来看，众多文献研究表明自尊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但

^① Harsh V. Pant “The US-India Nuclear Deal: the Beginning of a Beautiful Relationship?” pp. 455 - 472.

^② Ashley J. Tellis, “Should the US Sell Nuclear Technology to India? -Part II,” *YaleGlobal*, November 10, 2005,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should-us-sell-nuclear-technology-india-%E2%80%93-part-ii> (访问时间: 2013 年 7 月 12 日), 转引自刘思伟《印度在国际核不扩散问题上的立场与政策选择》,《南亚研究季刊》2012 年第 4 期,第 103 页。

关于自尊概念的讨论需要进一步的论据支撑，社会心理学家还需要从认同和群体行为的角度对此理论进行更详细的论证。当然，在将个体行为的研究结论应用到群体层次，特别是国家层次，还需进一步厘定共用的假定和设立合理的应用原则。个体的社会属性要求集体的归属感，人们总是为国家和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社会认同理论认为，这种对于某个特定群体的积极认同将增加自尊，如果所在群体的表现说明它是优于其他群体的，那么该群体的成员对自我的感觉和对群体的认同就更高。但是自尊所导致的影响并不总是积极的，因为心理学实验已经证明自尊与暴力和攻击行为存在一定相关性，自尊除了带来积极认同之外，自尊的高低或损害与否还会对个体和群体的行为方式产生负面影响，这对于预测国家领导人和国家的行为将带来积极借鉴。

根据对印度 1974 年第一次核试验和 1998 年 5 次试验的成因和效果的分析，本文在以上内容中检验了前文提出的自尊—攻击行为理论框架的解释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当印度国家实力相对较弱时，核试验无法有效传达国家实力，也就是说无法通过核试验使其他国家认同印度的国家实力，初步水平的核试验也没有促进国际社会与印度间的核合作，这突出反映在当时国际政治的两个主导大国，即美国与苏联的行为上，两国的反应是敦促印度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相对于 1974 年的第一次核试验，在 1998 年 5 月印度连续进行的 5 次核试验中，印度向国际社会传达的信息是印度已经跨过了核门槛，这成为印度国家实力上升的有力信号。同时，由于此次系列核试验水平较高，印度达到一个事实核国家的水平。因此，可以观察到虽然核制裁机制自动生效，但国际社会的制裁并没有得到彻底执行，并且多个国家的制裁在较短时期内就得以放松乃至取消，尤其是此时国际政治体系内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一改之前与印度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争论态度，积极与印度开展多方位的核合作。可以说，虽然核实力并没有必然地增加印度的国家实力，但成功释放的信号传递了印度争做世界大国的决心和潜力。

中印两国都是人口大国，都拥有核武器，常规军事力量大体相当，都

位居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市场之列。虽然历史上有过边界冲突,但从历史看两国处于和平的时间占绝大多数,只要努力增强战略互信,互相把对方看成是己方发展的重大机遇,中印在亚太是可以同时崛起和共存的。中国已经被认为是 21 世纪的两个主导大国之一,除中国之外,印度的经济潜力和政治潜力也都表明 21 世纪的印度将成为亚洲向世界贡献的又一强国。^①从国际政治的多边互动来看,无论是在中美印三方还是在中俄印三方互动的格局中,印度都是可以打破力量对比平衡的重要国家。正如印度战略界所强调的,印度对外战略目标的核心是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多种选择,扩大印度的战略空间和提升独立自主的能力,印度实现国家利益不应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在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道路上应保持最大限度的战略自主。^②印度期待的角色正如其领导人一再强调的,不会做遏制中国的工具。^③印度正走在成为世界大国的道路上,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提升在亚太和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印度都需要发展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两者是相互竞争又彼此需要的,中印在很多领域都具备广阔的合作空间。从这点看,中印在增进深入了解、构筑新型大国关系方面还大有可为。21 世纪的亚洲将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亚洲的和平与合作对于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其中不能也离不开中印的合作与发展。

① Amitava Tripathi, "Prospects of India Becoming a Global Power," *Indian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Vol. 6, No. 1, 2011, p. 63.

② Sunil Khilnani et al., *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2012, p. 8, http://www.cprindia.org/sites/default/files/NonAlignment%202.0_1.pdf (访问时间: 2013 年 7 月 12 日)。

③ 《印度称不做遏制中国的工具》, 2013 年 3 月 19 日,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03/29/23666227_0.shtml (访问时间: 2013 年 7 月 12 日)。